

古人吃烧烤

北京的炙子烤肉是北京“三烤”(烤肉,烤鸭,烤白薯)之一,“北京吃儿”的代表作。不同的是,汉代时,人们还只注意到了“桑炭甚美”之于烧烤的重要性,发展到了“炙子烤肉”,则更是发挥柴薪之能事,把果木、炙木等作为燃料,熏得烤肉鲜嫩沁香,以至于汪曾祺、唐鲁孙等一众美食高手根本不舍放下手中的筷箸:“炙子”的铁条之间有小缝,下面的柴烟火气可以从缝隙中透上来,不但整个‘炙子’受火均匀,而且使烤着的肉带柴木清香;上面的汤卤肉屑又可填入缝中,增加了烤炙的焦香。”甚至到了身处他乡也念念不忘的地步。

从烧烤的器具与燃料的步步完善中,我们能看到由烧烤所带动的礼俗社会的形成。正所谓“使人以

有礼,知自别于禽兽”,当烧烤将人与动物分别开来那一刻,“礼”也就此产生了,自此以后的数千年时间里,礼俗不断互动,中国社会也发展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形态。

而以烧烤为例,我们亦能知晓诸多饮食文化从“礼”到“俗”,从“仪式组”逐步转换到“氛围组”的现代化进程。夏商周时代,民以食为天,此时俨然已经有了“礼”的萌芽,先民们试图举行特殊的仪式来与祖先神灵取得联系,而饮食则是互通有无与表达情感的重要媒介,如商代的“燎祭祀”,即是用烧烤祭祀的先例。

到了“器以藏礼”的周代,以烧烤为代表的饮食则已经成为与国家社稷相关的礼制内容,《礼记》中有:“夫礼之初,始诸饮食。其燔黍捭豚,污尊而抔饮,

蒉桴而土鼓,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。”这一时期,“礼”成为一种伦理规范,其重要内涵是“别”,教人明尊卑有别、晓男女有别,对人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所约束。

此时的烧烤当然不能免俗,它与相应的青铜器俨然成为权力分配的象征物。从食材种类、食用数量,甚至是食用的先后次序、调料的摆放等都要依“礼”而行。如《礼仪》中记载的诸侯款待小聘问的使者的食礼有:“月乡以东,膾、臠、牛炙,炙南醢,以西牛胾、醢、牛膾,膾南羊炙,以东羊胾、醢、豕炙;炙南醢,以西豕胾、芥酱、鱼脍。”其中,对牛炙、羊炙、豕炙等烧烤都作了严格规定。

在后世的发展中,关于食用烧烤的礼制更为丰富,对食用时间、所用薪柴

也要讲礼仪

都有所倾向。如《战国策》里就有对齐桓公夜里“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”这种不合时宜地吃烧烤的指责,甚至还预言“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”,烧烤成为能影响国家命运的最高礼制,而唐人魏征主编的《隋书》里还记载了北魏人王劭以烧烤所用的木炭为例,试图劝说在位者重修食礼:“今温酒及炙肉,用石炭、柴火、竹火、草火、麻蓼火,气味各不同……纵使百姓习久,未能顿同,尚食内厨及东宫诸主食厨,不可不依古法。”

由此可见,烧烤的礼制起源早,且极为严苛。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,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在逐步改善,以往只有皇亲贵胄才能吃到的肉食,民间也渐渐能有条件解馋了。因此,“礼”慢慢往“俗”发展,烧烤成为民间在特定日子

也能享受到的美味。如老饕苏轼被贬谪到海南时,就曾得友人赠送,品尝到了烤生蚝的美味,“取其大者,炙熟。正尔啖嚼,又益煮者。”激动之下还留帖纪念。

没了仪式的约束,吃烧烤更见自在从容与抚慰人心的快感。到了明清时期,烧烤更是成为大雪天、过年过节、款待友人的必备吃食,清人杨静亭就曾撰《都门杂味》中赞道:“严冬烤肉味堪饕,大酒缸前围一遭。火炙最宜生嗜嫩,雪天争得醉烧刀。”烧烤就这样从庙堂走向江湖,一步步走入民间,成为人间烟火的典型代表。

如今,吃烧烤更是极富动感场面,且不说每个城市都能代表出战的灵魂烧烤,就单单还拿北京的炙子烤肉来说,就已经被“吃出了花”来,在汪曾祺

笔下,北京的玉渊潭可不仅是赏桃花那等风雅场所,而是群众吃烤串的传统地界儿,一到秋天,玉渊潭就整个儿浸在了烤肉的香味里,体现了十足的“在野精神”。

烤肉喷香只是其一,炙子烤肉的精髓还在吃法,地道的炙子烤肉分为“文吃”和“武吃”,“文吃”指的是由厨师烤好以后再端上来,吃法斯文,细嚼慢咽。但炙子烤肉最正经的吃法则是“武吃”,正如王世襄所形容的:“记得五十年代前每次去烤肉宛,总是等到那副老炙子腾出空儿时才去烤,一足蹬板凳,一手执长筷子,随烤随吃……”毫不夸张地说,唯有深深镌刻在骨子里的烧烤,才能有这般魔力,直叫人不由地打开五感六识,热炽真诚地全身心参与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

那些被追捧过的古代文艺大咖

文艺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、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苏东坡等文艺大咖及他们的粉丝有不少佳话流传千年。“诗圣”杜甫公元744年秋天就曾为偶像“李白”写下七绝诗:“秋来相顾商飘蓬……飞扬跋扈为谁雄。”

不过,杜甫眼中偶像的“飞扬跋扈”,并非贬义词,而是点赞李白傲骨嶙峋、狂荡不羁的性格。在这首《赠李白》七绝中,作为李白的粉丝,杜甫凸显出偶像李白狂与傲的风采、骨力、气度,彰显了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。这首七绝,不仅同杜甫歌咏李白的其他14首诗篇是一脉相承,而且形象地揭示了李白的性格和气质特征,也含提醒偶像之意味。

开元二十三年(735年),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、著名书法家贺知章读了《蜀道难》和《乌栖曲》,即被李白瑰丽的诗歌和出尘脱俗的风采折服,称之为“谪仙人”,34岁的

李白迅速成为“超级网红”。后经贺知章和唐玄宗最亲近的妹妹玉真公主推荐,天宝元年(742年),雄才大略的唐玄宗“以七宝床赐食于前,亲手调羹”之重礼聘请李白为翰林,李白迅速成为文艺大咖。在皇帝身边干了不到两年时间,豪迈奔放的李白就厌倦了,整日与贺知章等结“酒中人仙”之游,又得罪了杨贵妃、高力士等小人,被唐玄宗“疏之”并“赐金放还”。

天宝三载(744年)夏天,名扬全国的李白见到自己11岁的粉丝杜甫,此后一年多时间里,李杜两次相约、三次见面,同游东鲁,抒怀遣兴,建立了深厚友谊。此后虽再没见面,但彼此相互关心、牵挂一生。李白依赖作品和人格等实力圈粉,从未借助手段制造流量、提升人气;而杜甫持续关注、点赞偶像李白,先后赠诗15首,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,“白诗无敌,飘然思不群”“李白一斗诗百篇……天子呼来不上船”“昔年有狂

客,号尔谪仙人。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。声名从此大,汨没一朝伸。文彩承殊渥,流传必绝伦。”

与李白相比,唐代诗人白居易圈粉更厉害。唐代文学家、史学家段成式笔记小说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八说,作者曾在荆州街头,见到一个名叫葛清的“超级白粉”宛如“白舍人行诗图”:“自颈以下,遍刺白居易舍人诗”,段成式与荆州客人陈至呼现场“令其自解”,葛清甚至对脊背所刺“白诗”任何一句出处和意思等都对答如流、毫无分差。

平头百姓疯狂追星也就罢了,有“小太宗”之称的唐宣宗李忱及日本嵯峨等几代天皇也纷纷追星白居易,日本醍醐天皇更大胆表白:“平生所爱,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。”日本平安时期作家紫式部创作的被誉为“日本版红楼梦”的《源氏物语》引用白诗达80多首,白居易堪称红遍海内外的巨星。而被海内外广泛崇拜的白居易,并不认为自己多么

高人一等,白居易晚年更是追星李商隐并坦言,如果有来世,一定要做李商隐的儿子,如此人生就圆满了。

跟李白、白居易相比,大文豪苏东坡更是大宋全民偶像和美女心中不折不扣的“宝藏男神”,其受追慕受爱重之深之广,即使在他屡遭贬谪、偏居荒蛮之时也未受影响。宋人史料笔记中都能见到苏东坡身影。宋王辟之史料笔记《渑水燕谈录》卷四谓:“子瞻文章议论独出一世,风格高迈,真谪仙人也。至于书画,亦皆精绝。故其简笔才落手,即为人藏去,有得真迹者,重于珠玉。”苏东坡虽才高八斗却待人温厚,“有片善可取者,辙与之倾尽城府”。不仅士大夫们把苏东坡当偶像,贩夫走卒、老奴少女也同样崇拜他,每到一地或途经路过,都是万人空巷迎或送。苏东坡始终受粉丝追慕,除文艺魅力令人折服,与他人格、胸怀等有关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

◎收藏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“九一八”事变纪念邮票

文/于佳平

1931年9月18日夜,日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,反诬中国军队所为,随即悍然袭击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,震惊中外的“九一八”事变由此爆发。今年是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90周年。

1946年9月,日本投降刚刚一年,位于东北的佳木斯市邮电局利用伪满洲国的1角2分普通邮票加盖“九一八”事变纪念邮戳,纪念“九一八”事变15周年。邮票中间字样为:“勿忘九一八(佳)”,右侧竖幅字样为:“中华民族”、左侧竖幅字样为:“醒自斯日”。下方为面值:伍元。

为了让中国人民永远记住这段惨痛历史,1947年9月,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在哈尔滨市发行了一套“九一八”事变纪念邮票。邮票画面为东三省地图,图中标有东三省省会位置和省名,上书“九一八纪念”,左右两侧分别为“反对蒋美反动派”和“制造二次满洲国”字样,下方为发行的局名:东北邮电管理总局,以及发行时间:中华民国三十六年。全套邮票共4枚,图案相同,面值为10元(灰绿)、20元(紫红)、30元(棕灰)、50元(红)。